



# 中国阿尔巴尼亚交恶纪实

1978年7月7日,作为对中国外交部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

## 霍查的“反击”

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

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使馆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家撤离的车队驶离驻地时,恋恋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 中国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都照明抵达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讲,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即表示反对搬迁,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

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都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都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繕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通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都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

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正严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声不响地拆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摘自《“山鹰之国”亲历》,作者王洪起)

## 章太炎和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绦,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文二中中了清朝统治者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便下令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还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往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收到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说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 历史声音

### 王芸生告诫大家要敢于讲真话

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再次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朋友。”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 叶公超打电话给“叶公超的老子”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著名外交家、书法家。

叶公超有一次打电话给台北的《中国邮报》,找发行人余梦燕。“她不在。请问贵姓?”电话中的声音说,“我是叶公超”。接电话的人认为他是开玩笑,贸然抢白他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子。”“好,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余梦燕?”叶公超心平气和地说。

### 吴佩孚的同学几次三番讨官当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要求到河南当县长。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后原件发还。此公居然是笨伯一个,不识时务,又梦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批复:“且去种树。”

### 毛泽东为国家发展感到焦虑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的。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 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1878.10.1—1965.12.21),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民间传言,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还。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岂知,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后来更正说:“事实上并非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索帖”之举确实“够英雄”,但是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跳出黄炎培的“方圆论”,怎么看都不逾矩。

# 渡江战役前国共两军齐击英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屯兵长江北岸,集结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一线。渡江大战爆发在即,此时解放军方面警告外国船只,所有外国军舰务必于4月20号前撤离长江,美法等国都知趣地将军舰撤出长江。

然而,英国远东舰队军舰“紫石英”号不顾禁令,公然在4月20日晨驶过江阴,进入东路军即将横渡的江面,江北岸的解放军在8时30分鸣炮警告,要

其退出战区。但紫石英号并未返航或停航,反而不顾警告继续加速行驶。

三野炮兵负责封锁江面任务的两个炮兵连的六门火炮随即开火,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在历时数分钟炮战中,紫石英号舰桥被直接命中,正、副舰长均负重伤,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紫石英号转向南岸,随后驶入一处浅滩搁浅。最后英舰挂起白旗,并发电求救。在看到白旗

后,我方停止了射击。

得知紫石英号被炮击的消息。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中将率领“伦敦号”、“伴侣号”与“黑天鹅号”准备接应紫石英号冲出解放军控制区。4月21日晨,英军的三艘军舰由江阴向上游行驶准备解救被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发现了这三艘英国军舰,由于英国军舰挡住了我23军渡江的航道,我军在多次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对英舰开火了,英舰随即开火还击。

令英军愕然的是,长江南岸国民党军桥头堡的炮兵也对其轰击。参加这场炮击的一位国民党军官日后说,国民党军队中多数人都具有民族自尊心,痛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看不惯国民党内一些洋奴的嘴脸,他们见到解放军炮击英舰,都心里大感痛快,佩服之余,不甘落后,也纷纷加入对英舰作战。在国共两军炮火狂飙的打击下,英舰狼狈而逃。据战后统计,这次事件英军阵亡近百人。

# 沙镇倾心关爱女孩打造和谐计生

沙镇讯 近年来,沙镇镇把深入推进“关爱女孩行动”作为构建和谐人口环境的重要举措,以建立关爱女孩募捐组织为抓手,创新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切实帮助女孩和生育女孩家庭解决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力促进了全镇人口、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创新载体,形成合力,努力打造关爱女孩基金平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09年成立了全区首家关爱女孩基金会,使之成为连接政府、社会和女孩的平台和纽带。成立关爱女孩基金理事会及监事会,具体负责资金

的管理、救助对象的审核等工作。自2009年以来,共开展三次集中关爱助学活动,帮助失学、辍学及家庭困难女学生500人次,发放关爱助学资金20余万元。

落实政策,贴近群众,切实完善女孩利益导向机制。针对独女户和双女户家庭出台了多项奖励优惠政策。一是对女孩户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升学、就医、土地使用、银行贷款、农业经济项目承包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和照顾。二是农村终身只要一个

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一次性2000元的现金奖励,并落实每月父母50元的奖励金。三是农村双女户女性绝育者每月落实50元的奖励金。四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对终身只要一个女孩户、60周岁以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家庭、双女绝育户家庭成员交纳的个人筹资,实行全免制度。

以人为本,突出特色,全面实施“生育关怀”。把“关爱女孩行动”与日常计生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实施“生育关怀”,进

一步深化计生优质服务。一是组织计划生育服务队为全镇20个独生子女困难家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60多件。二是镇村两级技术服务人员免费为8000余名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查体,同时提供生殖保健知识的服务。三是以人为本,变坐堂式管理为巡回登门式服务。镇计生办、妇联组织八大站室工作人员,组成服务队和计生服务直通车,每月固定时间在全镇七个工作点,现场开展面对面零距离服务。

(通讯员 王德国 郑成亮 胡学燕)